

「我和我的 T 媽媽」： 自由主義家庭觀的敘事建構

摘要：自由主義家庭觀強調人的個體性和兩性平等，對傳統家庭的權威性、倫理基礎造成了衝擊，現代社會中非傳統家庭形式受到越來越多的接納，然而，現代取代傳統是否意味著進步，依然是存在爭論的問題，透過「我和我的 T 媽媽」這個由三層敘事框架來呈現的非典型家庭故事，可以看到，對傳統家庭中非正義現象的揭露與批判、對不受家庭約束的自由生活的嚮往的敘事背後，傳統與後傳統之間的倫理分歧，並沒有被充分地認識清楚，當面對生存難題時，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倫理依然對個體具有吸引力，這種處於傳統與現代拉扯狀態下的現實，構成了個人的現代性處境。

關鍵詞：自由主義、家庭觀、敘事分析、日常對話

前言

《我和我的 T 媽媽》和《日常對話》這兩部由黃惠偵導演製作完成，分別於 2016 年和 2017 年在電視臺和影院播放上映的紀錄作品，講述了一個女兒和她的同志媽媽的家庭故事，影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導演本人也在 2017 年出版了同名散文《我和我的 T 媽媽》，並在各種媒體訪談和公開演講中，透過分享影片製作心路歷程，不斷豐富著這個故事。導演曾坦言，在自己的成長歷程中，經歷了對同志媽媽認知的巨大轉變，從自己從事社會性工作的經驗中，她接受了新的價值觀念，從而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媽媽，透過拍攝影片，把自己的家庭故事呈現給社會大眾，既是對自己堅持的價值理念的表達，也是與某種預先存在的社會文化腳本的呼應，本研究試圖從影片中多重敘事的建構邏輯和方式來探看，這樣一個特別的非典型家庭的故事，在當下社會被傳播與接受，所折射的故事講述者與社會閱聽眾共用著的自由主義的家庭文化價值背景，並進一步瞭解現代自由主義與傳統家庭文化在當代社會文化競爭格局中的位置與態勢。

一、自由主義家庭觀

臺灣社會在解嚴後，隨著融入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多元文化得到認同，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不同文化價值並存於社會各個層面，臺灣逐漸演變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在家庭這一場域，也呈現出不同價值理念與文化觀念的競爭、衝突、角力、共存的倫理道德多元化局面。

自由主義建構論家庭觀作為 20 世紀西方文化與社會、政治運動下的產物，其源頭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英國著名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他關於兩性平等以及對個體性的強調的思想，最早開啟了自由主義與家庭的緊張關係，一元化的婚姻家庭模式受到挑戰，甚至婚姻家庭不再是人生唯一選擇，離婚、獨身、同居、同性戀、婚外生子、非主流家庭等多元化的生活模式都成為可能的選項。密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早期自由主義的自由與權利概念，背後還是一套「男性沙文主義」的預設：他們所如此珍惜、願意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的自由和權利，是「一家之主」的自由和權利（吳翰，2001）。在《論婦女之屈從地位》裡，密爾為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發聲，認為在社會關係中，一個性別從屬於另一個性別是錯誤的。女性在社會中經濟能力的提升、社會權利的獲得，幫助其實現家庭之外的人生選擇，這就導致婚姻的崇高感和家庭的權威性逐漸下降。對個體性的強調，也加強了自由主義與家庭的緊張關係。個體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西方經濟學有關於理性人的假設，密爾認為只有一個人出於理性、獨立的感受和個人性格做出選擇，他卓越的潛能才可得到發展，婚姻也只是眾多選擇中的一個，應當允許不同的人進行對他人無害的家庭之外的「生活實驗」，從實驗的角度來看，各種選擇不分優劣。

自由主義的觀念進入臺灣社會後在年輕世代群體中被廣泛接受，慢慢擠壓著傳統家庭觀的空間，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家庭是一定歷史、文化條件下的人工構造物，其形式是由參與個體的同意所塑造的，其合理性根源也同樣追溯到一些與個人相關的倫理考量，比如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平等。換言之，家庭的合法性必須從它推進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效果，或者從它對個人自主和權威的保護上得到倫理辯護（王珏，2013）。在公共政策領域，自由主義建構論家庭觀認為應當優先

保護個人的權利和偏好，主張賦予同性婚姻、婚外生子、單親撫育等非傳統的家庭形式以同等、甚至優先的保護。在這個西方現代家庭觀念衝擊下，傳統家庭觀被懷疑、批判，其結構、形式、權威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各種傳統價值，都成為可以被改變和重塑的對象。

然而「現代」代替「傳統」，是否意味著進步對落後的超越，自由主義家庭觀是否優於傳統家庭觀，在當代社會語境中卻仍有許多質疑的聲音。從傳統家庭到後傳統家庭的轉變，有學者認為這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進步」，不如說是一場仍然在進行中的文化戰爭（王珏，2013），其質疑的對象直指被社會、政治的急劇變遷掩蓋了的基礎價值問題，比如，家庭是否有屬於自身的本質？如何理解家庭生活的倫理性質？傳統文化及其所支撐的傳統社會，比如儒家對此類問題的回答是否仍對現代社會有價值？學術上的辯論，反映的是文化多元化狀態下不同價值立場的競爭，而這種文化的競爭也會反映在真實的個人生活的家庭場域，「我和我的T媽媽」的故事，作為一個長時間跨度的現代非典型家庭的完整故事，是瞭解此種家庭文化形態及其演變的視窗。

二、日常對話的敘事性

本研究主要聚焦於《日常對話》這一紀錄長片以及片中的「日常對話」部分，運用敘事學與言說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研究獲得的語料來自女兒對媽媽的訪談，並不是純粹狀態下的自然對話，是女兒主動發起的訪談敘事建構的結果，

（一）社會敘事學及其分析工具

敘事這一概念的外延經歷了由窄到寬不斷擴展的演變過程，羅蘭巴特曾說：敘事是與人類歷史本身共同產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從來不曾存在過沒有敘事的民族（馬海良，2002）。泛敘事的主張將人們認知世界和彼此的所有溝通活動，都看作是敘事，日常借助語言展開的對話、訪談也都是敘事的不同形式；將日常對話作為一種文本進行敘事研究，範例並不多見，美國敘事學家戴衛·赫爾曼（Herman）在《社會敘事學：分析自然語言敘事的新方法》一文中，「把敘事學的方法和語用學、言說分析的方法結合起來，對一次社會語言學的訪談紀錄進行分析」（張蕃，2007），然而其針對的對象仍在於受訪者所講的故事，後來的研

究者，以赫爾曼 (Herman) 為起點，在各自的研究命題之下，開創性地發展了多種日常對話的分析工具，比如從敘事行動、敘事含義、敘事結構等切入角度進行日常對話分析 (張蕃，2007)。另有研究者則從自己的訪談語料中梳理出四種敘事形式，紀要、故事、自詰、宣言，以探看受訪人說了什麼與怎麼說之間的關係 (余貞誼，2011)。因為日常對話隨機性、流動性的特徵，在分析工具的運用上也就難有固定模式，需要因地制宜，根據不同的語料而採取不同的分析工具。本研究將紀錄片中的日常對話作為分析對象，在方法上向戴衛·赫爾曼借鑒，綜合其他研究者開創的分析工具，從多個敘事層面逐步遞進，進入具體的日常對話敘事分析。

(二)「日常對話」與三層敘事建構

從上述廣義的敘事學角度來看，到目前為止，有關「我和我的 T 媽媽」的故事，是來自於三個不同層面的敘事建構的結果：

第一個層面，即兼導演和女兒的黃惠偵主動發起的與母親「日常對話」的敘事建構。正如「訪談是一個人造的社會相遇的特殊形式，其中的敘說會依據脈絡、聽眾和敘說媒介的慣例而有所改變」(余貞誼，2011)，黃惠偵導演與母親的這五次「日常對話」式訪談，也是由「說者和聽者共同建構出來的，是一種充滿修辭、假設和解釋的互動創作」(余貞誼，2011)，因此，將母女二人的訪談敘事作為研究文本的時候，就不能只是關注訪談的內容，而是連訪談的形式，一併考慮進來，以探究「我和我的 T 媽媽」的故事為什麼會以這樣的樣貌被講述出來；

第二層面，紀錄片的敘事建構。紀錄片作為一種完整的文本形式，是形構此故事的主要媒介，《我和我的 T 媽媽》與《日常對話》基本內容相近，但風格和表現重心有所不同，在《日常對話》中，原實際生活中的五次訪談對話被剪輯成十個片段鑲嵌在不同的故事段落中，並以特定的聲畫技巧加以表現，形成獨特的敘事效果，因而，在以紀錄片中的母女對話逐字稿作為分析對象，進行具體的敘事和言說分析時，需要考慮紀錄片的總體敘事框架的影響，透過該敘事架構來理解對話；

第三個層面的敘事建構，即黃惠偵導演在《日常對話》獲得社會大眾與國際

紀錄片界肯定之後，在不同場合的演講與訪談，所講述的幕後故事和拍片的心路歷程，這個層面的敘說，以現在進行時態不斷重塑、推進著「我和我的 T 媽媽」故事在真實生活中的最新進展，紀錄片具有改變生活現實的力量，影片上映之後，創作者、故事主角與社會的互動交流改變了自己和其身處其中的社會環境，本研究將此作為「我和我的 T 媽媽」總體敘事的現實大背景。

三、自由主義家庭觀的敘事分析

(一) 敘述者的身份、姿態與視角

參與日常對話的母女二人的身份是一個特別需要說明的問題，在《日常對話》所呈現的這個特殊家庭中，媽媽有多重身份，從女兒的視角看她是媽媽，在同志女友看來她是情人，此外，她還是異性婚姻中的妻子，外孫女的外婆，兄長的妹妹，等等，在這複雜的家庭倫理關係中，她的特殊存在牽動著其他人，與之發生複雜的互動，形塑出這個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樣貌。導演黃惠偵也有多重身份，女兒的身份是《日常對話》敘事結構中的主要身份，此外在這個「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她也是一個女兒的單親媽媽，成為媽媽以後的新的生命經驗，是她拍攝紀錄片的重要推動力，使她成為這個近在身邊相處幾十年的同志媽媽的重新觀察者與對話者。

發起日常對話的主動、主導方是作為女兒的黃惠偵，拍攝這場日常對話的也是作為導演的她，媽媽在這一對話行動的過程中，處於被動防守的姿態，影片中出現了多次對這場對話的要求甚至是請求式的拒絕：

「不要錄了啊，我要走了。」「趕快問，問完我要出去了。」「不要再問這些了。」

媽媽不希望舊事重提，喚起痛苦的回憶，但是過去的回憶像魔咒一樣沉澱在心靈深處，成為生活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和永遠打不開的心結。按照導演的說法，發起對話的動機就是希望，能夠帶著媽媽去超越並走出過去，療愈心靈的創傷，就像在紀錄短片《我和我的 T 媽媽》中用牽亡的儀式過程所隱喻的那樣，要超度過去。然而，這一敘事的邏輯一直都是被安置於一對母女對過去苦難生活記憶的超越上，這與其他家庭類似的苦難敘事並無太大不同，觀眾對這部影片的反饋資

訊中，也提到並未感覺到黃惠偵導演特別為同志群體的權益伸張什麼，媽媽的同志身份在影片中似乎只有標籤意義，同志媽媽也還是媽媽，媽媽和女兒生命中的一致問題，首先並不是社會歧視，而是要面對那個痛苦過去的回憶，那個已經死去的家暴父親的陰影。

黃惠偵導演在社會性工作中接受了多元的文化價值，跳開傳統家庭的觀念桎梏，坦誠的講述一個在異性戀家庭中的同志媽媽的故事，在當下的臺灣社會語境中，這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被視為勇敢之舉，在這層意義上，該影片與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價值發生了強烈地呼應和共鳴。然而，有些錯位的地方在於，導演講述故事的動機卻是落腳在別處，而且同志媽媽處在被講述的位置，其自我的文化身份認同，並沒有女兒那樣清晰，在現實的生活困難面前充滿了對立場選擇的不確定。因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其實是一個傳統家庭視角下，講述的非典型家庭的故事，呈現的是有關生活苦難的普遍性生命經驗。

（二）訪談敘事的基本形式：發問與應答（Q&A）

訪談是一種敘事形式，它藉由參與者雙方一同建構完成，一般的訪談形式上由發問與應答兩部分結構組成，除了參與者的身份會影響敘事建構的樣貌，訪談問題的類型、發問的方式以及受訪者應答的方式，都是形塑敘事內涵的重要因素，本文接下來首先從訪談問題的類型入手展開分析。

1、問題類型之事實類問題

在影片十段左右的「日常對話」，女兒對媽媽提問的眾多問題中，有關過去生活的「事實類問題」占了絕大多數，比如：

關於媽媽小時候的生活，（女兒）：你是從小就都像個男生嗎？；（媽媽）：嗯，我從小就是這樣；（女兒）：那你小時候都在做些什麼……。關於外公、外婆與舅舅等娘家人的情況，（女兒）：外公，外婆或是舅舅，他們知道你交女朋友嗎？（媽媽）：後來你舅舅好像知道……。關於媽媽交往女朋友的問題，（女兒）：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你有沒有跟我們說過你喜歡女生，還有交女朋友，你有告訴過我們嗎？（媽媽）：應該沒有告訴你們這些。不記得有沒有跟你們說過……

林林總總的這些事實類問題大致指向一個相近的敘事意圖，即呈現一個真實

的同志媽媽的形象，在這一過程中，首先確認媽媽是同志的事實，接著瞭解媽媽小時候的成長經歷，然後從女友視角介紹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同志媽媽。上文曾提到，黃惠偵導演坦然地講述同志媽媽的故事，是其自由主義立場的集中體現，不管是在對媽媽的訪談對話中，還是在整個紀錄片的敘事構思中，塑造一個同志媽媽的形象，向觀眾和社會講述有關她的故事是影片敘事的中心。

按照導演在映後訪談中的描述，母女二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幾十年，對彼此的瞭解卻像是陌生人，有著厚重的隔膜，以致於在幾十年後，依然需要對過去的事實進行瞭解和確認，造成這陌生感的原因，或可以歸結為底層苦難生活造成人的不善表達，但從文化觀念來看卻不止於此，母親從小以同志身份生活在傳統家庭中，接受的卻是一套傳統的家庭婚姻文化腳本，長大後結婚成家，與其如她自己所說是與年少時的女友賭氣，不如說是因循著傳統家庭觀念中「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習俗慣性被動而為之，婚姻的不幸又使她成為單親媽媽，受到傳統世俗的另眼相看，可以說，傳統家庭中的那個世界對母親來說，是一個道德異質非友善的環境，她與家人、丈夫、女兒其實是貌合神離的「道德異鄉人」(范瑞平，2006)，但因為沒有文化價值立場上的自覺，母親只能將秘密鎖在內心底層，這應是隔膜感的深層原因。

時隔多年，時代與社會文化的氛圍轉變，黃惠偵導演感受到了在傳統家庭之外，對婚姻與家庭形式的多種選擇被接受的可能，同志婚姻、單親家庭、撫養，在自由主義價值取向之下都可以被社會接納是合理且應當受到尊重，家庭形式不再是唯傳統獨尊，正常與非正常家庭的界限也不再由某種權威說了算，這一切的變化，促成了黃惠偵導演決心要拿掉過去因為傳統家庭觀之下，被貼上的負面標籤，以及被社會邊緣化帶來的心靈痛苦，將外加的內在的心理包袱一掃而光，所以她主動地發起這一場看似平常卻極不尋常的「日常對話」，近乎固執地要媽媽說出過去的真實故事，只消說出事實就是對時代最好的呼應，也是對傳統最好的反抗，女兒要帶著母親，完成一次跨越傳統與現代的命運救贖。這一場對話和救贖行動，借著紀錄片與媒體影響力的放大，也會進一步推動社會文化價值的多元轉變。

上述對發問與應答的分析，從問題類型角度來看，除了事實類問題，還有假設類問題；除了問與答的言說順序之外，還有不問自答、答非所問、欲拒還答、非問非答等對話的例外形式出現。下文將擇其一二展開分析。

2、問題類型之假設性問題

在發問與應答的問題類別中，除了占絕大多數的事實類問題，也有少數但卻關鍵的假設性問題，事實類問題指向描述一個真實的同志媽媽的生命史全貌，假設類問題則將媽媽置於過去生命史的關鍵十字路口，在想像中為人生做再一次的選擇，尋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或者置於想像性未來情境中，面對可能的現實難題進行選擇，以此來窺探受訪者內心對某些人事物的願望、態度與看法，瞭解其思考邏輯、價值觀。

(黃惠偵)：媽，如果時間能倒轉，你可以重新再選擇一次。你還會結婚嗎？

(媽媽)：不會，我要自己一個人比較好過。(黃惠偵)：你也不會想生小孩嗎？

(媽媽)：不一定要生小孩，有小孩是以後老了比較有依靠。(黃惠偵)：如果以前同性也可以合法結婚。你也一樣，不想結婚，跟生小孩嗎？(媽媽)：是 我會這樣。(黃惠偵)：為什麼。(媽媽)：比較自由啊。(黃惠偵)：你會不會怨恨生下我們兩個。(媽媽)：不會，你們兩個跟着我也很可憐。

關於上述對話中的這一系列面向過去的假設性問題，媽媽在不同時間的回答其實是有出入的，據導演黃惠偵在接受訪談時透露，影片中有一段沒有剪進去的是，『我問我媽：「假設你當初嫁的，是會工作賺錢好好養家的『正常人』，那你還會去喜歡女生嗎？」她說不會，她會選擇跟其他正常人一樣，因為這樣比較輕鬆。我當下聽到很難過，想說：天啊！為什麼我們要為了過得比較輕鬆，而不去成為你真正的樣子。』

「每個人都要活成自己的樣子」，是黃惠偵導演在《日常對話》中想要表達的重要理念，在接受訪談時她直言媽媽不應該走入婚姻，更適合一個人自由地過日子，不應期待她是一般想像的溫柔媽媽。然而，對家庭生活的自由主義信念，在實際生活的世界裏，卻未必如在紀錄片敘事建構的世界裏那樣清晰和堅定。媽媽在面對上述假設性問題時的現實考量和顧慮，可看出傳統家庭觀之下的思考邏

輯：有小孩是以後老了比較有依靠、嫁個好人家可能就會選擇跟其他正常人一樣；而黃惠偵導演出於故事講述的需要，有選擇性地剪輯掉不符合自由理念的對話片段，表現出對想像中的社會文化腳本有意識的呼應。從這些言說與行動、理想與現實不盡一致的細節中，可看出在故事世界和真實世界之間，自由信念與傳統家庭觀之間某種潛在的拉扯與角力狀態。

自由主義家庭觀堅持契約式的家庭建構理念，將個人從既有的倫理規則和父權體制下解放出來，以一種理想的自由狀態在社會大環境中自我實現，自我決定想要的生活方式，活出自己本來的樣子，這些在現代文化語境中看來美好的價值理念，感召了許多人去追求，就像受到現實壓迫與傷害的《日常對話》中的諸多女性們，但是，在這些價值榮光背後，當真正面對生活現實時，仍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尷尬，自由主義的價值信念與社會實踐之間存在明顯的斷裂地帶，歸結起來，還是要回到人的自我實現與生存的根基問題上，人的自我實現與家庭的關係為何？人如何離開了家庭，以單獨的個體的方式直面社會，活成自己的樣子？這些在自由價值的光環之下被忽視的問題，仍有待仔細討論。

現代社會高揚人的價值，將個人的價值抬高到超出有形的社會組織之上，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組織，對於促進人的自由平等權益來說，合則用、不合則棄，從而成為一種工具化的存在，這就消解了家庭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積澱下來的倫理內涵，導致倫理空心化。從傳統家庭觀的觀點來說，人的存在與倫理意義上的家庭，有深刻聯繫，工具意義的家僅作為一個庇護，而倫理的家則是構成人的自我的重要部分，「儒家認為家庭是人必有的存在的身分標記，是人的存有論特性」（李瑞全，2013），人成長為自己的樣子是在特定倫理情境和家庭關係中實現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與道德義務是在家庭生活的語境中已經預先被給予的，不能還原為個體自由選擇」（王珏，2013），這是保障個體生命健全成長，社會總體繁衍存續的重要基石。因而，有關每個人可能成長為什麼樣子的問題，離不開特定家庭倫理與家庭關係的背景。反觀當下社會，家庭生活倫理空心化的現象，與現代人的虛無主義和無家可歸感有著深刻的聯繫。

家庭的倫理基礎與成員間的道德義務，不僅給人提供了一個面向社會時的

間地帶，「為其成員提供情感上、資源上及社會性的支援，同時將個體生命與超越的根基聯繫起來，通過家族時間線的延展將個體生命嵌入到更廣大的實在之中，並由此獲得超越於個體的生命意義」(李瑞全，2013)。因此可以說家庭是人形塑自我認同，成為何等樣的人的前提，也是人面對現實生存問題的保障，自由主義家庭觀在面對「撫養和教育未成年子女、贍養老人、醫療代理等涉及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存本質的實踐問題時，就不免捉襟見肘，困境畢顯了」(王珏，2013)。

《日常對話》的第一段母女對話，黃惠偵導演向母親提出的那個假設性問題「那如果以後我結婚你怎麼辦」，指向了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老無所養的實踐難題，這是從傳統家庭立場出發的提問：

(黃惠偵)：那如果以後我結婚你怎麼辦？(媽媽)：我就自己一個人吶，你男朋友有說要娶你嗎？(黃惠偵)：你自己一個人沒有人照顧。(媽媽)：不需要人照顧，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到處跑。(黃惠偵)：你要住在哪裡？(媽媽)：自己去租房了，不然要住哪裡？(媽媽)：去大同公園就有地方睡呀。很多人都睡公園。

綜合上述所有的假設類問題，母女二人的發問與回答，都圍繞著一個人在生活難題面前進行選擇時的困難。根據母親給出回答的邏輯，可以假設性推斷，如果最初的家庭生活沒有那麼糟糕，她便不會成為今天的樣子，從這一點來看，《日常對話》整體上是一個傳統家庭中的不幸故事，表現的是人在苦難生活中的尊嚴，就自由還是傳統的家庭價值觀來看，影片所傳達的立場遊走在兩者之間，用藝術化的表達方式調和了不同價值的矛盾與對立，這也許可看作在當下社會的家庭這一場域，不同價值與文化傳統的家庭論述，競爭共存的狀態。

3、問答例外形式：不問自答、非問非答

在「日常對話」發問與應答的訪談言說秩序之外，不問自答、非問非答，是比較特別的對話形式，特別形式也對應著特別的對話話題，這個話題就是關於那個從始至終不在場、但又像幽靈一樣無處不在的罪惡父親的故事，這是全部對話過程中，黃惠偵導演唯一主動向母親講述的部分，在對故事的描述方式上，這部分也用了具體的細節描述的方式，詳細地述說父親的所做所為。從整個紀錄片的故事架構來看，母女二人的十段對話各有其中心話題，這些中心話題連貫起來形

成影片的敘事線索，例如從關於自己婚後媽媽的去處問題開始，對話的話題先後有，回憶媽媽小時候的故事、給外婆掃墓、關於外婆、女友眼中的媽媽、家暴與逃離、關於父親等，有關父親的部分被放置在影片的最後，也突顯出對這一敘事重心的特別設置：

(黃惠偵)：我今天就是要告訴你，为什么我要拍这部片。(媽媽)：你要做这些？为什么不先问人家愿不愿意。(黃惠偵)：你是说录影吗？如果不是因为录影，有些话我也没办法说出口，说我心里的感受。你是不想录影，还是不想听我说话，也不想跟我说话。(媽媽)：我也知道你讨厌我。(黃惠偵)：我其实不是讨厌你，我是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爱我，我觉得是你讨厌我，但我还是很希望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虽然你觉得我很讨厌你，如果不爱你，当初离家去工作，我就不会再回来，不用回来扛那些债务，不用三天两头就看你发脾气，不用一直想到，想到以前还住在中和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让我跟我父亲一起睡……

從紀錄片與母女「日常對話」兩重敘事的特別安排來看，在「我和我的T媽媽」的故事中，罪惡父親是一切癥結的核心，是所有生活苦難的淵藪，母親和女兒同時是父親家暴和性侵的受害者，母女二人的誤解隔膜也是根源於那個給她們留下深刻心理陰影的父親，對父親的控訴和譴責，是整個故事的敘事重心。除了這一個父親，母女對話中還隱約提到了外公的故事：

(黃惠偵)：外婆，为什么会自杀？(媽媽)：「因为你外公也很会骂人。你外公很凶，我常看到他在骂她。她就是被骂到受不了才会想自杀。」

這是另一個關於家庭暴力以及女性作為受害者的生活苦難的故事，此外，媽媽的女友之一在接受訪談時也曾提到自己的家暴遭遇：

我先生对我很坏，我才会那么早就离婚，他好吃懒做，要我赚钱养他也就算了，但他三不五时就会打我骂我……

上述黃惠偵導演主動講出且放置在敘事序列最後部分的父親故事，與閃現在其他敘事段落的幾個傳統家庭中女性受害者的遭遇相呼應，譴責的矛頭均指向了作為父親與丈夫的男性，《日常對話》表達出來的自由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立場，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這些受傷受害者的述說，她們均是父職角色夫職角色淪喪的犧牲

者，最終也大都逃離或試圖逃離傳統家庭，選擇一種更為「自由」的生活方式，引申來解讀的話，影片要批判的是作為父親或者丈夫的男性背後的父權體制，在女性主義者看來，這個體制是一種不公平、不正義的威權架構，是女性受迫害的根源所在。現代社會在面對諸如家庭暴力、代際壓迫等家庭內部對人權益的侵害問題時，自由主義的家庭觀念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因為自由主義信念便在於將家庭視作促進個體自由、平等實現的工具性存在，「家庭正義的基石在於個人權利的維護，優先保護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平等是家庭首先的責任，如果家庭對個人帶來傷害、不能保障家庭成員的基本權益，它便失去了正義性與存在的合理性」（郭夏娟，2002）。

關於家庭的正義性問題，要追溯到西方社會對「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分，早期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家庭被視為一種「擴大的愛」的形態，屬於「私人領域」範疇，與正義原則不相關，而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把家庭理想化為「擴大的愛」的聯合體，與現代社會的家庭現實多有不符，因為「不論家庭成員之間有多少相互關懷，不論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共同的目標，每個人仍然是具有自己的個人目的和期望，他（她）們仍然是獨立的個人，有時這些目的和期望甚至是相互衝突的」（郭夏娟，2002），因此有必要把家庭視為具有「正義環境」特徵的「公共領域」，才有助於用正義原則調節家庭中諸如財產分配與暴力傷害等各種非正義問題。有關家庭正義問題的論爭，其實到最後還是落腳到現代社會以個體的人的自由、平等和權利為基礎的基本價值，「自由主義家庭觀使之將家庭看作僅僅是離散個體的某種集合，而家庭的目的也可以被還原為個體利益的集合」（王珏，2013），也正是基於此。

4、對話特別形式：沉默與反覆追問

《日常對話》中女兒對媽媽的訪談，與一般的訪談有所不同就在於，母女二人是一起生活數十年的熟識的人，其訪談帶有日常對話的隨意性，而少有陌生人之間正式訪談時，你問我答的形式規範，這種隨意性就導致一些特別的對話形式出現，比如沉默與反覆追問。影片中你來我往的對話轉折處，幾乎無處不有或長或短的沉默，甚至有一場母女「對話」只以沉默的方式進行，雙方枯坐數小時卻

不說一句話，沉默是日常對話的明顯特徵。導演在映後座談曾透露，其實母女二人在一起的生活鮮少言語溝通，漫長的生命中沉默才是常態現象，對話是非常之舉，當然，沉默並不等於沒有言說，而是一種無聲的言說，指向的是那個未曾被語言形塑、無形無象的過去的存在，那個過去的生活世界，母親本不該進入婚姻成為妻子，本不該生下女兒成為母親，以同志身份卻不得不與異性戀家庭中互為道德異鄉人的親人生活在一起，無奈無助不可言說冷酷又吊詭的世界，沉默或許是不得不的應對方式。

作為與沉默相對的非常之舉的對話，其實有強烈動機和目的，對話發起者相信，說出來才能對過去進行再詮釋，為當下生活尋找新的意義支點，也才可能療癒傷痛。在黃惠偵導演對母親說出來的所有話語中，「媽媽你愛不愛我？」這一問句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形成對母親的某種追問，追問的動作本身，不是要媽媽的一個回答，而是對母女關係的重新確認，為過往生活提供新詮釋、尋找意義支點，在整個「我和我的T媽媽」的故事建構中，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母女本來生活在一起，為什麼還要確認關係呢，因為女兒心中的媽媽和媽媽眼中的女兒，關係並不對等不在一個層面上，媽媽以同志身份對外宣稱女兒是領養的，而女兒卻從小到大對媽媽溫柔愛護的需要始終存在，「愛」的同義詞是在乎，發問是為了確認你到底在不在乎我，我在你生命中到底處於什麼位置。這個執著地發問動作，既透露出母愛缺失的焦慮，又表達了內心深處對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在茫茫社會中提供安全與庇護的家的需要。儒家的傳統家庭觀，將個人安置在家庭中的生活方式，在當下社會仍有廣泛的影響力，其確立的倫理準則深入到傳統家庭中人的內心深處，即使在追求更多元生活方式的當下，在自由建構組成的家庭中，人對安全、幸福、愛的想像和需要，依然會落入傳統家庭觀的價值理念之中，《日常對話》中女兒接受同志媽媽的事實，卻依然固執地尋找傳統家庭之下的母愛，這讓人思考傳統家庭對當下社會的個人來說是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結論

「我和我的同志媽媽」的故事在當下社會語境中被講述與傳播，折射了多元文化的總體生態。自由主義家庭觀推動了傳統家庭向後傳統家庭的轉變，在這一

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們對家庭中個人自由價值的追求，受到傳統文化的家庭觀念影響，兩者時常處於拉扯、角力狀態中。從《日常對話》中「母」「女」帶有日常對話色彩的訪談敘事中，可以看到，它綜合了女性主義對男權體制的批判，對傳統家庭中非正義現象的揭露，對人不受家庭約束地自由發展自我的嚮往，對傳統家庭的愛、安全與幸福的需要與想像，敘事者站在非典型家庭和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立場上，宣稱張揚個人的價值，卻也對傳統家庭意義下，基於倫理意義上家的整體具有依賴和需要，這給我們的啟發是，當人們面對真實家庭生活中的現實問題時，傳統與後傳統之間的分歧或許並沒有被充分地認識清楚和得到解決。

自由主義思想以西方現代社會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會基於理性去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一假設輻射到家庭中的個人選擇亦是如此，認為每個人個體的權利是家庭建構的基礎，但在真實的家庭生活中，個人的權利鑲嵌在家庭關係的複雜脈絡之中，家庭整體的倫理內含是規範這些關係的基石，自由主義思想在批判傳統家庭中失敗父職、夫職以及男權體制，將傳統家庭倫理消解以致於空心化後，個體的人從傳統家庭中被剝離出來，卻又產生了直面社會時的無家可歸感。由此來看，自由主義家庭觀鼓勵個人自由選擇家庭形式，表面上賦予了更多的選擇與自由，然而從長遠的效果看，卻是陷個體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王珏，2013），這是現代性焦慮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構成了我們的現代性處境。

參考文獻：

孔祥明（2006）。〈台灣「家庭社會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會議論文。

王珏（2013）。〈家庭與生命倫理學中的文化危機〉，《中外醫學哲學》，11（2）：129-134。

李淑菁（2017）。〈想像與形構：臺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之論述分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7（2）：1-44。

李惠珊（2008）。《女同志家庭親子關係法制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

李瑞全 (2013)。〈儒家之家庭倫理與生命倫理爭議：回應恩格爾哈特教授幾點意見〉·《中外醫學哲學》· 11 (2)。

李桂梅 (2004)。〈現代中國的社會倫理與家庭倫理〉·《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33 (2): 51-54。

余貞誼 (2011)。〈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臺灣社會學》· (21): 101-156。

吳翰 (2001)。〈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出發研究女權問題——評約翰·密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論婦女的屈從地位》〉·《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 :41-42。

林火旺 (1996.9)。〈自由社會倫理體系中家庭的定位〉·海峽兩岸《中華文化與中國宗教》學術研討會·成都。

范瑞平譯 (2006)。《生命倫理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原書：恩格爾哈特 H.Tristram Engellaardt · Jr.)

馬海良譯 (2002)。《新敘事學：跨學科敘事理論譯》。北京：北京大學。(原書：戴衛·赫爾曼 David Herman)

葉其松 (2015)。〈韋日比茨卡文化腳本思想闡析〉·《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 (4): 56-63。

張蕃 (2007)。《日常會話敘事分析——新敘事學的實驗性寫作》。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郭夏娟 (2002)。〈女性主義視野中的家庭正義——奧金、羅爾斯、桑德爾〉·《婦女與社會》·(5):73-76。

陳嘉明 (2006)。〈現代性的虛無主義——簡論尼采的現代性批判〉·《外國哲學研究》· (3): 119-125。

傅修延 (2014)。〈從西方敘事學到中國敘事學〉·《中國比較文學》· (4): 1-24。

楊菊華、何焯華 (2014)。〈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的變遷與延續〉·《人口與社會》· 38 (2): 36-51。

楊靜利、劉一龍 (2002)。〈臺灣家庭的生活歷程〉,《臺灣社會學刊》·(27): 77-105。

範宏雅 (2012)。〈談話分析的社會研究方法論意義〉·《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9 (4): 41-45。

藍佩嘉 (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 97-140。

劉靖、王伊歡 (2011)。〈同性戀者身份認同研究綜述〉·《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8 (1): 131-139。

My gay mother and I: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liberal family view

Abstract: The liberal family view emphasizes the individual and gender equality, which has an impact on the authority and ethical basis of traditional families. In modern society, non-traditional family forms are more and more accepted. However, it is still a matter of debate whether the substitution of modernity for tradition means progress. Through the "my gay mother and I", an atypical family story that is presented in a three-tiered narrative framework, you can see that the et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post-tradition have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behind the narrative of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the non-justice phenomenon in traditional families and the yearning for a free life without family constraints. When facing the survival problem,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s remain attractive to individuals, this reality, under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onstitutes the individual's modernity.

keywords: Liberalism Family values Narrative analysis Daily conversation